

粮食大亨

〔美〕丹·摩根 著

崔高壁 邱年祝 吴学淑 译

对外贸易出版社

Dan Morgan
Merchants of Grain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79

粮 食 大 亨

(内部发行)

崔高璧 邱年祝 吴学淑 译

*

对外贸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长安街 2 号)

对外贸易出版社第二发行组发行

(北京安外小关北京外贸学院内)

北京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32万字 $14\frac{1}{4}$ 印张

1982 年 6 月第一版 198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统一书号: 4222·18 定价: 1.50 元

译者的话

粮食问题是当前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一，为国内外各方面人士所瞩目。美国记者丹·摩根所著《谷物大亨》一书，出版于一九七九年，以介绍当前世界五大粮商的发家和经营内幕为主，但内容广泛，对近代粮食贸易的发展，战后美国粮食政策的演变，苏联两次抢购的内幕及其影响，粮食与政治、外交的关系，当前粮食问题的症结等等，都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阐述，内容生动、活泼，材料丰富，对从事粮食贸易和研究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有些观点是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

本书共十四章，第一、二章由邱年祝同志译出，第三、四章由吴学淑同志担任翻译，第五至第十四章由崔高璧同志翻译，全书由邱年祝同志负责校订。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讹误之处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翻译过程中，承蒙张南玉同志多方协助特致谢忱。

目 录

一、巴拿马的格伦纳斯公司	1
二、面包和王朝	28
三、谷物贵族	49
四、凭聪明机智生存	76
五、劳里埃宫饭店聚会	108
六、填鸭式推销术	144
七、谷物巨头	194
八、粮 商	217
九、军规—22	246
十、权力金字塔	277
十一、粮食武器	313
十二、外交作物	345
十三、最无情的行业	386
十四、地震灾难中的骨肉兄弟	425

一、巴拿马的格伦纳斯公司

粮食是宝中之宝

——列 宁

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六月底，巴黎的人比平时更为漫不经心地信步走过面包房、妇女用品商店和维克隆街歌剧院区的小画廊。人们的心思已开始从工作飞向度假的海边和乡间。但是，在维克隆街二十四号五楼，船舶代理人吉恩·勒布雷特和他的助手们，还在像隆冬那样忙碌和专神灌注。这个花白小平头的勒布雷特正紧张地拨丹麦和挪威的电话。办公室里呈现出某些忙乱景象——也许是电传机发出的嗡嗡声和滴滴答答的响声吧——暗示着有一笔大买卖正在进行。

勒布雷特的电话挂通了，对方是一个在哥本哈根的船东。略事寒暄后即言归正传：他的某些客户有意租赁货轮。他抱歉地说，这些客户要求绝对保密，不得道出他们的身份。不过，勒布雷特准备用他的家族惨淡经营半个世纪的老字号的卓越信誉来支持这几个特殊人物。他们拥有瑞士几家银行巨子的令人刮目的金融保证，资信无可指摘。

在哥本哈根的船东有意问津。当时的生意清淡，俄国的商船队故技重施，正在用降低运价的手段，抢走西方轮船公司的生意。M·勒布雷特先生能否只赐告客户的名称？

勒布雷特先生简短的回答是：“巴拿马的格伦纳斯公

司。”

当勒布雷特在打这些电话的时候，他的副手们也向全世界发出了一系列的电传。这些讯息宣布，格伦纳斯有意租进中等型号的轮船，租期一至三年，装运散装干货到一些尚未宣布的港口。这些船，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是“适航大湖区的”，——船身要狭小到足以通过圣劳伦斯水道进入大湖区，并备有在河闸中保持船身稳定的特殊装置。从维克隆街这间昏暗的办公室发出的这类信息毫无异常之处，它在纽约、日内瓦和鹿特丹的交易中心，以及伦敦圣玛丽斧大街的波罗的海商业和船务交易所当天收到的数以百计的信息当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到一九七五年已经有二百三十一年历史的波罗的海交易所是不列颠商业帝国的一个缩影。它恰巧座落在教堂旁边，具有英国绅士俱乐部的风格，矗立的大理石柱顶着一个高入云霄的圆顶。身穿制服，头顶镶金制帽的司阍人向进进出出的人行礼如仪。在里面，成群成堆的人在交谈，有的则在携手漫步或者躲在隔壁的书房里打盹。波罗的海交易所是一个巨大的市集——世界不定期船队（没有固定航线的远洋航轮）的经纪中心。租船人和船东的代表都在这里碰头，一次握手就可决定价值数千万美元计的交易。在波罗的海交易所的某一天里，一条希腊船可能觅到把一批法国面粉运往埃及的货载；国际钢铁公司可能找到一只把矿砂从扎伊尔运往费城的轮船；一条香港的野鸡船可能受命开往日本的废钢场；或是一条五万吨的油轮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租约。波罗的海交易所还是一个传播新闻的场所，是世界贸易战略监听站之一。人们往往可以从这个地方租船市况的枯荣首先觉察出经济的衰退或复苏。

在波罗的海的经纪人所经营的几十种货物中，最难预卜

的莫过于谷物了。一个国家的歉收可能预示着一笔巨大的谷物交易，——以及巨额的租船交易。有些经纪人从一九七五年六月格伦纳斯电报中看到的，就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征候。所谓“适航大湖区的”轮船，通常是指驶往北美小麦产区中心明尼苏达的德卢斯和安大略省的桑德湾的轮船。但这仅仅是猜测而已。真正洞悉格伦纳斯租船是要运什么东西和运往何方的，只有吉恩·勒布雷特和他的少数几个助手——但他们守口如瓶。

× × ×

自从人们开始吃面包以来，就有谷物贸易。^①文明古国希腊和罗马从它们的殖民地进口小麦，苏格拉底也认为，“不懂得小麦问题的人不配当政治家。”自十四世纪以后，地中海的商人（在沿海城邦大公们的资助下），在灾荒时就从北欧筹集过救灾用的小麦。在十八世纪，商人们麇集在伦敦的咖啡馆，交换产自奥得河东岸波兰封建庄园的小麦行情，当时小麦是从但泽港流入伦敦的。

但是现代的谷物贸易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告产生。俄罗斯南部和北美洲成为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新兴工业城市的小麦主要供应来源。工业革命驱使了千百万欧洲的农民和劳动者脱离他们的食品来源，进入工业城市，造成了对小麦的贪得无厌的需求。基本必需品——做面包用的小麦、织布用的棉花和制燭用的牛脂——的国际贸易，逐渐取代了在此之前，一直是商人主要业务的，专为富人服务的古老的奢侈品——香料、象牙、丝绸和靛青——的贸易。国际上对小麦需求的不断增长

① “谷物，可食用的，淀粉质的草本植物种子”。这是字典里的定义。在本书我是笼统地使用“谷物贸易”这个名词。谷物商也经营大豆（豆科的一个品种）。

改变了世界贸易的路线。俄罗斯的农民用木制的牛车把小麦运到濒临黑海的敖德萨；加利福尼亚的商人则把整袋整袋的小麦装上巨大的帆船，绕过霍恩角，行程一万四千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新生的英国工人能吃上面包。

现代远程谷物商的始祖是希腊人，这是毫无足怪的。他们拥有船只，在地中海众多口岸的业务关系，以及庞大的、组织严密的氏族（这使他们在一种必须要有可靠伙伴或亲戚的事业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十八世纪末叶，当俄罗斯帝国扩张到黑海，敖德萨成为沿海大平原小麦的主要出口港的时候，俄国小麦到伦敦的运输，就是由这些希腊人安排的。

但是，到十九世纪的后半期，西欧的商人就已使这些希腊人相形见绌，他们当中的大部份人发祥于欧洲大陆的商业干线——莱茵河畔。出身于阿尔萨斯村民的利奥波得·路易-达孚到了十九世纪末就完全支配了敖德萨的贸易。利物浦取代伦敦成为英国重要的谷物进口港，当地的进口商和磨粉厂不仅仅是指望俄国，也期待从北美、阿根廷、印度和澳大利亚获得小麦供应，——西欧人已开始逐步支配了这些贸易通道。

在一九七五年夏天控制着世界谷物贸易的五大公司都发祥于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城市，尤其是英国城市，需要外国小麦的时期。到一九七五年，始创这些公司的家族已经是驰骋于三大洲；他们安然无恙地渡过战争、饥荒、经济崩溃和革命；他们经常迁移，易国而居，就像交换粮食一样地变换他们的国籍；他们视历史发展的需要，同国王、女皇和共产党统治者结盟或分道扬镳。

然而，这些公司在大部份时间里是想方设法隐蔽在阴暗的角落里。这也许是古代中间商的噩运，使得他们如此地遮遮掩掩，避人耳目，——过去惧怕的是，一旦发生缺粮或饥荒，

人民就会把一切厄运都归咎于他们，进攻他们的粮仓，把他们揪到城市的广场，没收他们的存粮。况且他们的这种担心也是事出有因。大陆公司的弗里包格家族就曾经两度，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四年，另外一次是在一九四〇年，被德国军队从他们设在本国的总部扫地出门。一九一七年，达孚家族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黑海的资产被没收。卡吉尔家族和麦克米伦家族（卡吉尔谷物王朝的继承人）有两次濒临倾家荡产的边缘。不论他们的顾虑是来自何方，他们之所以遮人耳目，部份是作为减少担惊受怕的手段，部份则是他们生存下来的诀窍。在这件事情上的事实是，在本世纪的大部份时间里，大多数的美国人从未听到过这些在全世界经销美国谷物的公司。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名声大大不如石油业的“七姐妹”那样传闻遐迩，妇孺皆知。它们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卡吉尔、纽约的大陆谷物公司、瑞士洛桑的安德烈公司、巴黎的达孚公司以及合义公司（即邦奇公司——译者）——这些公司都可以自诩为（用卡吉尔的话来说）：“在我们的最好的主顾当中，还有一些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

这五家公司是如此成功地成长、发展多种经营和把业务扩展到各大洲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所以当大多数的美国人，在一九七二年俄国购粮事件中，才第一次听到它们的名字时，这些公司已经是跻身于世界最大跨国公司的行列了。卡吉尔和大陆大概可列为美国两家最大的私人控制的公司，而邦奇则是世界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年，卡吉尔每年从遍及全球的业务活动中所获得的纯利超过固特异轮胎与橡胶公司，其年销售额超过西尔斯（Sears）和罗伊巴克（Roe Buck）。这些公司还在银行、船务、房地产、旅馆业、油漆和玻璃工业、采矿、钢铁工业、养牛业、碾粉

业、牲畜饲料加工业和商品交易所经纪人事务所方面拥有权益。合义有五万名雇员，主要集中在阿根廷和巴西的油漆、纺织、食品加工和碾粉业；也有一部份分散在世界各地。这些公司还拥有自己的全球情报部门——从未出版过片言只字的私人新闻机构。

恰如石油为石油公司渗入铀、煤、化工和塑料工业实现纵向和横向一体化提供资金那样，谷物给五大谷物巨人战后的扩张提供了现金流量和资本。这些公司尽管是神秘莫测和不引人注目的，却是二十世纪末叶经营基本资源的分配和加工的新型全球性公司的近乎完美的典型。在其早期阶段，它们只不过是一些中间商——殖民地时代的小角色，当时公司权势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而这些谷物公司却从未像联合果品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全盛时期那样拥有巨大的种植园；也不象“伊克松”那样控制了石油“源流”的“水龙头”。它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却是由全世界的亿万农民种植出来的。不过在最近几年，没有控制原料资源，已不再是一种弱点了。在一九六〇年以后，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已经把它们控制的资源部份地或全部地交给了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政府。然而这些公司的势力却未见削弱。由于控制着分配系统、加工厂、技术、资本、以及同买主和卖主的业务联系，这些公司本身已经是成为不可或缺的了。例如，一九七〇年，十家大轮胎和橡胶公司属下的橡胶园仅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百分之十五的天然胶，但却消费着这个星球所生产的天然胶的将近百分之七十五。这是一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千千万万胶农为几个大轮胎制造商生产橡胶的世界。

谷物贸易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如果不是一模一样的话。这些公司没有生产谷物，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不利，也不是软

弱的表现。完全相反。农民承担着价格下跌、恶劣气候和政府有时推行压低农产品价格政策的风险。这些离生产还差一步的公司满可以不管价格的起落而坐收盈利。

处于世界谷物分配和加工体系的中心的是这五大家。它们把资金投放到船务、仓储、交通运输和加工厂——把小麦碾成面粉、大豆变成烹饪油和豆粕、玉米变成牲畜的混合饲料或供软饮料和冰淇淋用的液体增甜剂等谷物“精制厂”。它们也经营谷物的“输送管道”——从农民一直到外国消费者。美国出口的所有谷物，有半数是由卡吉尔和大陆经营的——而美国的出口量则占世界谷物贸易总量的一半（在某些年份，卡吉尔还是法国小麦的主要出口商，法国小麦的出口居世界第三、四位）这五大家支配着共同市场的谷物贸易、加拿大的大麦贸易、南非的玉米以及阿根廷的小麦贸易。在六十年代，这几家公司还把生意扩充到食糖、肉类和木薯淀粉。这些公司的董事们还把资金注入到一些邻近农村的“上游”设施中去。卡吉尔经营从美国内陆每列五十至一百节车皮的装满谷物的铁路运输。这些公司的美元流转额达到非常巨大的数字，除看惯石油业统计数字的分析家以外，谁都会有这样的看法。根据联合国的数字，这些公司所控制的烹饪油、谷物和动物饲料等行业在一九七四年的贸易额达三百八十三亿美元。

在现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这些公司一概力求自己严守中立（就象其它巨型的跨国公司那样）。它们把居住在一个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民族主义、贸易不受到规章制度阻碍的世界，看作是主要的利益；而国籍身份不明，则是他们和早先商业帝国的区别。这些现代谷物公司同诸如巴林兄弟公司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一家英国的大商业银行。里奇留

在十八世纪曾经说它是（与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并列的）“欧洲六强之一”。谁也没有怀疑巴林兄弟是英国人。事实上，也正是他的英国人的身份，才得以树立起势力和威望。这是一种永远不会对大英帝国的利益产生反作用的，帝国权力的大胆的、独立的但又合乎情理的扩张。今天，只有少数几家大的日本贸易公司——三菱、丸红、三井——在某种程度上是其本国对外政策的工具。现代的谷物公司，跟其它跨国公司一样，其效忠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模糊不清的。象合义这样的公司，几乎可以说，根本是无国籍的。它于十九世纪在荷兰发迹，然后迁往阿根廷。而在七十年代，它的最高统帅，博恩家族和赫希家族，则住在巴西和西班牙。

这些谷物跨国公司与其它同时代的公司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与众不同的私人结构。大陆公司的弗里包格；合义公司的博恩和赫希；卡吉尔公司的卡吉尔和麦克米伦；以及用家族名称命名的达孚和安德烈等七个家族，都是拥有全权的家族。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但拥有这些公司的大部份股权，而且担任着每个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和高级经理人员，跟洛克菲勒家族迄今仍然控制着“伊克松”的日常业务，卡尼基家族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每项重大决定仍然是独断专行一模一样。人们可以从这些谷物公司查觉到某些见诸史册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一种在当前这个工业以后时代还幸存下来的，继续在发挥作用的寡头统治。这并非说，实业界没有残存的家族王朝。美基林家族还经营着名列世界第三位的轮胎公司；罗思柴尔德家族仍拥有他们的银行；亨利·福特依旧对他的公司施加影响；韦尔豪泽家的第四代正统治着美国最大的木材公司。但这些都属例外。十九世纪实业巨子的后代

大多迁居纽约或棕榈滩，或是干脆改行了。费尔斯通家族已经离开他们设在俄亥俄州阿克隆城的轮胎公司，摩根家族已不再左右银行和铁路的决策。轰轰烈烈的奠基人和雄心勃勃的早期创业者的后代大多退出了舞台，尽管这些家族当中还有不少人继续从公司攫取财富。

但是，这些谷物世家，就象希腊船东那样，仍在想方设法地保住控制权。也许是为了教训一下那些试图怀疑他们的权威和守业能力的职工，他们有时也会炫耀一下实力。一九七五年，当蒸蒸日上的达孚公司把它的巴黎总部迁入离凯旋门五六条街区的一幢现代化玻璃办公楼时，皮埃尔·路易-达孚不喜欢兰色玻璃的色调，一声令下，全部换成比较准确地适合他的胃口的玻璃。这就是皮埃尔先生的特权。（这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组，除谷物外，还经营船务和银行。幸运的是，路易-达孚家族有干练的人材——皮埃尔和他的堂兄弟让和法兰索瓦——可以分管这些部门，他们三个人分工负责，这是一种比之权力斗争远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大陆公司，米歇尔·弗尔包格走到那里，公司总部就设在那里——可以是他在纽约市内，洋溢着艺术气氛的公馆；他在巴黎的寓所；他的滑雪棚；他在康涅狄格的家；或是他在瑞士群山中的别墅。大陆是一家鉴赏家云集的公司，据说“有许多自视甚高的人物，但是只有一个意见”——米歇尔·弗里包格的意见。

家族的控制是绝对的。但是继承问题经常是一个使人操心的问题。这些家族不能忘怀邦奇家族的遭遇。在本世纪初，邦奇家族失去了对其公司的控制——没有儿子或接班人来为这个王朝的生存进行战斗（邦奇兄弟当中只有一个人生了五个小孩，都是女的），控制权于是落入赫希家族和博恩家族

之手。

当这些家族开始他们漫长的家史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谷物会象一九七五年那样，在国际事务中起核心作用。谷物贸易成为一种每年涉及几十亿美元，以亿吨商品计的行业，是最近几年才有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每年越过国境或跨洋过海的谷物，很少超过三千万吨。到一九七五年已接近一亿六千万吨，增长之惊人只略逊于石油贸易。象俄国和印度这些曾经一度是出口谷物的国家，已经变成进口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第一次大规模进口小麦。食用大米的人民养成了对面包的爱好，政府发现满足这种嗜好则是有利的。对千百万从农村迁入城市，割断传统食品供应的人来说，面包成为一种理想的食物。一个一个的国家被纳入世界商品粮食贸易体系。到七十年代，进口小麦在几十个国家的贸易中，是一个花销很大的因素，而且往往是挪用本拟投放在其它方面（包括国内农业投资）的外汇的原因。

在比较富裕的国家，人们抄袭美国人的食谱，多吃用谷物饲养起来的牛肉、猪肉和家禽、少吃土豆、面包或大米。时髦的日本青年到“麦克唐纳”饱餐“汉堡包”；有钱的南美人则在到处矗立的山打士上校的巨大塑像下面，到供应美国式炸仔鸡的餐馆用饭。快餐连锁商店遍及全球。这种饮食习惯需要数量庞大得多的谷物供应。到七十年代初期，在世界每年生产的小麦、玉米、大麦、燕麦、黑麦和高粱中，动物吃掉的数量，跟人类消费的，不相上下。单单是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的牲畜和家禽所吃掉的，就占每年谷物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谷物的供应来源，远远不如其它基本物质那样广泛。有

许多国家拥有多余的石油、铝矾土或铁矿砂。但拥有余粮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其中之一是美国。在农业方面，超级大国只有一个。衣阿华州生产着这个星球十分之一的玉米；堪萨斯和南达科他州生产的小麦，比澳大利亚的总产量还多。谷物的输送纽带把美国农民和亚洲、欧洲、非洲和南美洲的人民联结起来。（美国）有二分之一的小麦、三分之一的大米和大豆、四分之一的玉米输往国外。谷物流向四面八方。人们把俄亥俄州的小麦碾成面粉，做成印度的麦饼；华盛顿州的小麦运往朝鲜做点心；北达科他州的杜兰姆硬小麦变成黄色的调制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面食的面粉；依何华州的玉米喂养着欧洲的猪，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米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晚餐。

美国人对于他们的谷物在世界经济中的日益重要的地位，一直是认识不清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迁离农场，切断他们世代务农的根基，并为他们的富裕感到踌躇满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认为，技术、化肥和新式的杂交种子多多少少可提供长期性的保障，可以抵御尘暴的再度出现——尘暴是一个在当代美国人的记忆中逐渐淡薄的历史插曲，那时候，美国农业惨遭旱灾的摧残，被迫进口小麦。

美国人在农业和食品的丰富方面是有许多足以自豪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粮食缓和了世界各地的灾难。它使欧洲和亚洲的饥民得以果腹。在建立反共经济堡垒方面建立了功勋。其后，美国开始通过“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向国外运出比过去多好几百万吨的粮食援助。分发这种粮食似乎是满足了美国人的一种人道主义的冲动。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包含了某些古老边疆传说中的东西，在缺粮时，

比较幸运的人理应努力帮助不幸的人。但是，在这种粮食援助中，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出于自身利益和现实政治的因素。它有助于处理堆积如山的美国“剩余”粮食，而且这些粮食主要是运给“友好”国家的政府的。然而这种援助的基本方面却给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的花言巧语给搅混了。他们一味地陶醉于日益严重的自鸣得意和民族优越感之中，确信美国人民正在“养活全世界”。

俄国人比世界上的任何人更了解粮食政治的现实。他们是从严峻的直接经验汲取了这种教训的。莫斯科的那些老当权者们，对饥荒的实际经验毫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人民挨过饿；在一九三二——三三年，苏维埃农业强制集体化所引起的骚乱时期，乌克兰人民再次挨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更多的士兵和老百姓在围城中成为饿殍。难怪苏联报纸把收获的消息作为头条新闻。

到七十年代，饥饿已不再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政府给农业拨了巨款，成果显著。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二年，苏联的谷物产量翻了一番，从每年一亿吨增至两亿多吨。这部份要感谢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理的决定，他命令在西伯利亚西部平原开垦几百万英亩的土地种植小麦。这个地区的产量尽管难以预测，它终归是提高了这个国家的产量。

但是，正如苏联领导人所熟知的，真实的情况，并不象统计数字所描绘的那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苏联的农业效率特别低下。俄国总的谷物生产落后于美国，而要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更多的东西，又存在着许多难题，令人望而生畏。一九七二年，从事农业劳动的工人仍有三千七百万人——几乎占苏联劳动力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农业生产率却

落后于其它国家。

除了结构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俄国的天气也是一个经常使人担惊受怕的问题。这个国家的谷物耕地有三分之二处于雨量不足地区。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来自北大西洋的强烈海洋气流，使降雨量增多，冬季比较温暖，夏天比较凉爽，所有这一切对谷物的生长是很理想的，俄国农业的重大增产，恰好发生在这四个年头。

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根本性的：俄国人吃的不如大多数发达国家——事实上也不如那些受苏联势力支配的毗邻的共产党国家的市民。在苏联军队于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推翻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人情味的社会主义”试验六年之后，被统治的捷克人每人每年吃肉一百七十三磅，而统治者却只消费一百零八磅。（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看起来是如此温饱、如此富足，以致有些占领军不能相信他们是入侵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在食品和农业体制方面的缺陷造成了棘手的战略问题和政治问题。一九七一年，苏联承诺向东欧、古巴、北朝鲜、北越和埃及提供八百万吨本国产的或其它国家产的谷物。而领导层却在这些帝国义务和第九个五年计划所做的改善俄国人民饮食的承诺之间左右为难。谷物供应不足骤然之间成为苏联实现其成为世界上最有势力和最有成就的国家的野心的一个致命弱点。从其它方面看，它是其帝国内部的一个恼人的不稳定根源。俄国和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在给他们的人民提供与其军事和工业发展相适应的生活水平方面，正遭到日益增强的压力。这表现在一九七〇年波兰政府打算在圣诞节前提高食品价格时所发生的流血暴乱。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提价是合乎道理的。波兰政府对食品价格是给了巨